

16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中美苏战略三角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六)

中美苏战略三角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

P

1938.6.25.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六)

中美苏战略三角

本社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125 字数: 105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09-015-9/D09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3225·050 定价: 1.10元

编者的话

80年代以来，各国都在调整内外政策，世界形势在变化。在此环境下，对国际形势和格局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西方所谓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或战略三角关系，是否仍起作用，将会如何演变；在此三角内，美、苏将采取什么新的政策；美国怎样联系三角关系估计中国的政策。凡此诸种问题，都是美国学者在继续探讨的重要课题。他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多数认为，虽然美国不再可能在战略三角中占据“左右逢源”地位，但三角关系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对美国制定和实施政策仍是“重要的”。为此，我们特选译了美国有代表性的学者和机构的8篇有关文章。当然，他们的观点，乃至他们依据的事例，必将有某一倾向的偏见，因为他们是从美国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这8篇文章中，有历史性的叙述和分析，有展望性的估计，也有理论性的探讨。其中特别是美国兰德公司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纪要，综述了30多位重要学者和官方的意见，其中不少至今仍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值得一读。

1987年9月

目 录

如何处理战略三角关系·····	美国兰德公司 (1)
战略三角关系: 80年代的中美苏关系 ·····	西沃利思·比亚勒 (30)
处理三角关系: 可供美国选择的战略 ·····	阿诺德·L·霍利克、理查德·H·所罗门 (36)
未来三角关系中的中国 ·····	小威廉·H·格莱斯廷 (43)
战略三角中的中美安全关系 ·····	乔纳森·D·波拉克 (51)
未来战略三角中的苏联 ·····	托马斯·W·罗宾逊 (64)
从尼克松到里根: 中国在美国战略中 地位的变化·····	班宁·加瑞特、邦尼·格拉泽 (76)
战略三角: 竞赛理论初析 ·····	洛厄尔·迪特默 (105)

如何处理战略三角关系

美国兰德公司

提 要

背 景

兰德公司于1983年5月5~6日在华盛顿首府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主题是“处理战略三角”，这是由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资助的。与会者有35位高级官员和政府外的外交政策分析家。讨论会广泛讨论了同制订和实施美国对苏、中政策有关的概念问题和实际问题，也讨论了这些政策在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相互作用问题。

基 本 问 题

讨论会是围绕三个广泛的主题组织的：战略三角的历史演变；它当前的动态；它对美国政策的含义。讨论中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谈到“战略三角”时，我们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我们是怎样给它下定义的？它包含些什么？从政策角度说，它的实际含义是什么？

前10年间处理三角关系中有些什么教训？

本文选自美国兰德公司1984年印发的《处理战略三角》讨论会纪要。

三角的性质改变了没有？如有变化，是怎样改变的，原因是什么？美、中、苏关系的前景如何？

“战略三角”概念仍然有效吗？如仍有效，美国处理三角中的关系的适当政策是什么？如果“三角”概念不合适，那末美国可以采取的其他政策是什么？

讨论会强调，在政策制订者中间需要在这些和有关问题上，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政策上，取得更大的一致看法。

主 要 结 论

为“战略三角”设置定义，不会比对它的实际政策含义进行估计更为容易。大多数与会者认为，美国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需要某种“三角”意识，因为三个国家中每个国家的行动都对其他两国具有战略意义。但与会者对于三角的确切性质和它的实际含义却有重大分歧。一些与会者认为，三角一词是对现实过于简单化和容易引入歧途的说法，对美国政策没有或只有不大的实际作用。其他与会者认为，三角是对国际战略环境的确切描述，是美国对苏联和中国政策考虑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三角主要是一种比喻，他们提出，尽管三角概念不应上升为教义，也不应因此而模糊了对国际问题的其他重要讨论，但它仍不失为抓住国际环境重要方面的有用方法。

从过去处理三角关系的教训中，得出了以下一些广泛的结论：

三角的“全盛时期”（从美国角度看是70年代初期）是一些特殊条件形成的，这些条件已不大可能再次出现。美国是当时一种特殊环境的受益者。

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心是决定它对三角的政策的主要因素。尽管近几年来由于中国致力于现代化而经济因素在中国

外交政策中日益重要，但在中国对三角的政策中，以及对中国在三角中的立场而言，经济因素只是第二位的。

中国的主要安全考虑是苏联威胁的程度以及美苏关系的状况。中国对美苏联合反华的担心一直是很重要的因素，197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以某种方式靠拢美国来避免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况”。

与会者关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产生何种以及多大影响的问题，没有定论。虽然美国对北京的政策也许有过某种影响（在影响的程度问题上则有很大分歧），但美国未能用很有把握可以预测的方式来施加影响。这样，把美国的影响作为形成美中关系的一个因素的潜在价值就减弱了。

与会者一致认为，战略三角的性质已有重大变化，美国一度享有的“左右逢源”地位已被中国占有。这是中苏关系改善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美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前几年美中关系的严重紧张也促成了这种变化。但与会者对于这种变化是否具有重要战略影响则看法分歧。

至于前景，多半要看中苏关系的演变。虽然与会者并未形成一致看法，但大多数似乎并不认为莫斯科—北京的关系会有重大变化。同时，很少与会者认为美国会有多少机会在三角中回到“左右逢源”的地位，尽管不少人认为这是理想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中程核武器问题有可能成为重新取得这种地位的工具，对这种说法几乎没有人予以支持。

在三角概念是否仍有作用的问题上，有两派相当明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这种概念，在实际中而不是在理论上，作用有限，美、苏、中的力量对比极不相称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了。虽说美国的对苏政策应该考虑到中国，一如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考虑到苏联，但美国决策者不应该只看到三角关系，不应该把三角概

念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模式。另一派则不仅强调形成三角概念有其好处，而且强调它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一派认为，由于三国的幅员和力量分布情况，其中一国与另一国发生关系的方式必然会影晌所有三国。由于这个原因，安全问题不能不成为三国关系的中心问题，“三角”概念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处理今后的美、苏、中关系，与会者提出了三种概念模式：恢复美国“左右逢源”的地位；回到中美联合反苏的关系；按照基本上单独的轨道执行政策。与会者对每种模式的功效和长处都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但没有明确达成一致见解。不过，大家一致认为，美国在1981~1982年间采取的政策并未奏效。与会者深为担忧的是，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很难达成一致看法，而且，往往简单化地用“非友即敌”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与会者还一致认为，美国在同期内的对苏政策限制了美国在处理三角关系时的作用；改善美苏关系会对美中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政策处理方面的问题

尽管讨论会中对许多问题提出了种种看法，但大多数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处理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方面，需要有一项复杂的、能相互作用的政策。不管每个与会者是否都同意按三角关系来看待世界，但他们几乎都同意，三国相互联系的基本安全利益需要美国制订能起相互影响作用的政策。

其他有关政策处理方面的问题还有：

要避免简单化地描述美中关系或美苏关系（如简单地把中国列为“友”或“敌”，或只根据反苏来对待中国）。

重新把有限而有实质性的安全因素引入美中关系。

鼓励中国同美国进行更大的合作。

一、战略三角的历史演变

概 述

这次会议对战略三角的由来和演变的讨论，集中在四大问题上：（1）促成美、中接近的迫切战略因素；（2）美苏缓和对三角的演变所起的作用；（3）决定中国对外政策方针的诸因素；（4）美国政策对中、苏行为的影响。讨论中得出了两点主要结论：（1）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一直是决定中国对三角的政策的主要因素。（2）苏联的威胁和美苏关系的状况一直是这种关注的主要内容。会议在三角的由来问题上看法一致，但在华盛顿对中苏对外政策方针的影响的程度问题上看法不一致。

三角的由来：对迫切的战略因素的估计

多数与会者认为，三角的“全盛时期”（70年代初期）反映了一种今后不大可能重新出现的特殊形势。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军事威胁恰好发生在中国需要医治文化革命的创伤的同时。当时中国关心它的安全，而苏联则急于促进与美国的缓和并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两者相结合便使美国在同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中处于一种令人羡慕的“左右逢源”的地位。

70年代初美国所享有的政治和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使美国可以作出战略抉择。正如有的与会者所说，当时苏、中双方都希望影响美国的行为，特别是想阻止华盛顿同其主要对手合作。到70年代中期，苏联仍抱有中美和解进程可能出轨和逆转的希望；直到70年代后期，莫斯科对美中交往感到最担心的后果（华盛顿和北京的安全合作）才显现出来。同样地，中国一再表示担心：美

国鉴于中苏之间的敌对，可能会不把中国当一回事，或者会试图利用北京作为美苏竞争中的一个卒子。对于美国来说，与会者认为当时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在于：究竟把三角政策主要作为一种为了美国对苏、中双方都占上风而采取的策略行动呢，还是作为一种为了限制苏联的行动和阻止它在地缘政治上的进展势头而制订的目标更大的战略计划呢？

在整个70年代，在美、苏、中三国中，美国在战略的相互影响方面保持了最大的机动性。显然，同中国人打交道存在着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但是苏联扩张政策的一贯性（对中国和对全世界都如此）使这种风险值得一冒。与会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战略三角给中国人提供了一座“桥梁”，美国可以借此采取有利于两国安全的步骤。

美苏关系的冲击：缓和的效果

与会者一致认为，美苏关系的状况一直是影响战略三角演变的主要因素，其中特别重要的是70年代初走向缓和的行动。但是对于美国在“三角关系”的条件下能得到什么好处，与会者看法并不一致。一派意见认为，苏美之间保持既对抗又合作的双重关系最有利于美国同时加强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影响。有几位与会者注意到，70年代初，美国的决策者们曾得出结论说，当中美关系正在改善而苏联人也看到了美苏关系改善的前景时，美国的对苏政策目标最容易实现。根据这派意见，莫斯科当时明显地有着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动机（例如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柏林问题上的四方协定），以免被排除在美中建立关系所造成的日益改善的国际气氛之外。

但是根据另一派人的意见，70年代初期恰恰是苏联得以搞成对美不利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并保持其在第三世界的进展势头的时期。从这种观点出发，即使苏、中双方都想改善对美关系，

也不一定有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因此，不论美国取得三角中的“左右逢源”地位能带来什么假设中的好处，坚持对抗苏联力量这一目标仍应在美国对中、苏的政策中得到更加重要得多的考虑。

正象缓和是影响三角演变的重大因素一样，苏联对改善中苏关系的兴趣同美苏关系的恶化直接有关。但是有几位与会者注意到，即使莫斯科同北京的关系有所改善，导致中美加强关系的基本条件（苏联实施霸权主义威胁到美中两国的安全）大概将继续存在。

根据这种看法，美国必须把美苏中之间的相互影响所造成的战略后果放在政策考虑的首要地位。一位与会者注意到，对于三国来说，三角关系的本质仍是安全问题。苏联领导人由于害怕两线作战的挑战，他们对三角的看法自然不同于华盛顿和北京的看法。因此，这个三角形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等边的，而且这种不对称性也不会自动给美国带来好处。

中国的战略立场：决定着北京的政策方向

中国在战略三角中所处的相对于美苏的地位，也引起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作为三国中力量最弱、最易受打击、也最难发挥力量和影响的一方，中国对于这个它所无法控制的世界上所存在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不得不作出反应，并且不得不依靠与更强大的国家合作以建立战略平衡。结果，中国在三角关系中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美苏关系的状况、中苏关系的态势，以及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制订出来的。

在中国人所关心的各种安全问题中，苏美联合反华的可能性被列为重要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担心并不是不切实际的。1970年以来，中国一直通过靠拢美国来避免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况”。但是当美苏关系发生可以觉察得到的恶化时，中国就

设法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拉开距离。当苏美关系处于稳定而又基本敌对的状态时，即当两国间既不存在进行共同统治的前景，也不存在发生直接对抗的前景时，北京就企图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来为自己谋取好处。而当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利益时，则不论当时美苏关系状况如何，北京都要向威胁较小的那个超级大国靠拢。

因此，全体与会者事实上都认为，对国家安全关心一直是中国决定其在战略三角中的立场的主要因素。历史档案中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经济方面的考虑曾经在中国决定其战略立场时起过核心作用。虽然近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已成了更加重要的政策重点，但是同安全方面的利益和需要相比，它至多也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中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对它的对外政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领导人为了要使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致被人看作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或是损及中国的“自力更生”誓言，曾经遇到过很大困难。

关于中国战略立场的变化问题，还有一种与上述看法有关而又有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把中国安全问题的焦点放在美国因素上。按照这种看法，中国之所以曾出现对美国拉开距离的几个时期，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在可靠性和一贯性方面没有能满足北京的期望。只要中国人感到自己被美国抛弃，或者美国没有能顶住苏联，中国人就会疏远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中国人在三角政治初期得到的主要教训是，他们受到了美国的利用。这一教训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对与美国进行全面的、有信心的合作的兴趣。

有一位与会者提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意见，他认为问题主要不在于美国没有遵守它对中国所作的诺言，而在于美国一开头就对中国许诺得太多了。美国的这种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它只会助长北京对美国产生美国所无法满足的过高期望。

虽然讨论会上没有任何人否认苏联对中国构成了政治和军事

威胁，但也有几位与会者提请大家注意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内部考虑。美国普遍地倾向于接受中国对1949年以来中苏关系史的看法，特别是接受北京所强调的莫斯科对中国采取了霸权主义行径并亟图侵犯中国主权的说法。有一位与会者认为，中苏联盟实质上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婚姻。但另一些人反对这一看法，他们指出，有许多中国人现在仍热烈地称颂那一时期的成就和苏联对中国的大量援助。人们很少知道中国在50年代与苏联人相处时的情况——例如，当时中国领导人中的不同派别对苏联各有何种看法，他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等等。这些与会者认为，我们特别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当时与苏联人关系最密切的那些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这些领导人中有许多近年已重新上台，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计划越来越需要他们所受的技术教育和专门知识。他们当前重新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有着什么潜在的政治意义，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而且，中美和解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一位与会者认为，中美和解的最惊人之处并不是它的实现，倒是它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实现。对中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发生在1969年，当时苏联人发出了一个可能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隐蔽的警告。但是中国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向美国靠拢以便采取行动。这一情况说明中国国内在向美开放的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这位与会者说，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人对中国关于对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的深度和广度如何产生疑问。

美国的作用：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影响程度

在讨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时，与会者意见也不一致。一派意见认为，美国是中国政策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既需要，也向往，并期待得到美国的支持，但是如果美国缺乏明确而一贯的反对苏联人的方针，则中国人就会在与华盛顿的

交往中大大后退。另一派意见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主的角色，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考虑对它的影响，至少应与某种更大的战略构想对它的影响相等。

根据各人的不同观点，可以得出下列几种不同的结论：（1）美国在中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没有始终成功地或明智地加以运用；（2）美国在影响中国的政策方面能做的事极少，因此不应过分努力去企图影响中国的政策；（3）美国对中国的决策具有某种间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可以很有把握地加以预测的，从而降低了它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讨论会结束时，这个问题仍没有取得最后解决。

在讨论“三角”对苏联的决策的影响时，意见分歧较少。多数与会者一致认为，在70年代初期，美国曾希望通过改善对北京的关系来影响苏联人采取较为合作的态度，但莫斯科却把与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的时期当作机会，来试探美国对建立一个公开反华的联合阵线的态度（注：这种联合阵线限制了美国影响苏联政策的潜在能力）。到70年代中期缓和出了问题后，通过三角政治来影响苏联行为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遥远了。一位与会者说，苏联人明显地企图阻挠中美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和加强，但是美国一直没有能成功地利用莫斯科的这种企图来获得对苏联决策的更大影响力。的确，当苏联人越来越看出把美国拉入一个公开的反华阵线的前景正在消退时，便一面加强包围中国，一面周期性地对北京作出政治姿态。因此，大多数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简直没有利用自己在三角中的地位来直接影响苏联政策的活动余地。

二、当前三角的动态

概 述

在讨论当前动态的几次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1）最近中国的战略和对外政策方针变化的重大意义；（2）三角发生进一步变化的前景及其战略性后果；（3）盟国对地区安全和武器控制问题的看法所具有的影响。其中多数问题都未得出明确的一致意见。关于中国对外政策变化的幅度及其对美国 and 盟国利益的影响，明显地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关于中苏关系将来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关于苏联是否会愿意对中国作出让步的问题，也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

中国最近战略方针的变化

1. 对中国政策变化的解释

关于中国最近战略方针变化的讨论，是从以下这样一种看法开始进行的，即认为中国在三角中的地位在过去10年中已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虽然它仍是比其他两角弱得多的一角，但它与自己10年前相比已富裕得多了。与会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很了解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为什么相信现在中国需要美国的程度已比过去几十年降低的原因。虽然没有人反对这种解释，但有人在中国的重要性有多少要归功于三角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种与此有所不同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中国强烈要求维持三角，因为它使中国得到了用其他方式所得不到的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的确，中国人害怕三角会失去它的现实意义，从而导致中国丧失它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

在评价最近中国在战略三角中的行为时，与会者中有着明显

的不同倾向。一种看法十分强调文化因素的决定作用。按照这种看法，不应过分重视中国在行为上的变化。虽然变化是有的，但是中国的基本做法或“风格”不会变。中国的基本做法的基础是中国的权势感。这种权势主要是指享有某种“身份”，而不是指“参与”决策。因此，即使当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缩小时，它仍能保持这种权势。结果，中国采取了这样的基本做法：在道义上摆出高姿态，使别国因感到“羞愧”而不得不采取中国所认为“合适”的态度。对苏联，中国人既要吊它的胃口，又不真正采取多少行动；对美国，既要刺它一下，又不冒风险使中美关系发生无法弥补的损失。中国的这一基本做法可以说明它为什么老是用一些奇怪的字眼来形容中美关系（例如说关系“停滞”）。因此，人们很难说清楚中国人所认为的关系“良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

另一种看法十分强调合理性因素对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作用。按照这种看法，人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为什么在1969~1970年间向西方靠拢的原因，那就是它在文化革命期间的孤立处境，以及它对当时所面临的威胁的看法等。同样地，人们也很容易根据客观情况理解中国为什么在80年代初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的原因，那是因为它认为苏联的威胁已经减少，而且它已进一步认识到从国外寻求技术所需付出的代价（以社会污染的形式）。这样，中国自然就将设法阻止外国对它内部事务的影响，而不是进一步与西方相结合。主张这种看法的人把中国目前对美苏双方的政策都看作仍在变动之中，还没有由于迫切的文化因素而确定下来。他们预计中国政策还会出现进一步的变化，因为目前的政策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但是，正如一位与会者所指出的，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第一种看法的问题是患了人们估计民族特性时的通病：对一些态度大体相同的领导人，往往忽视他们之间的差异。